

西北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及领属后缀*

徐 丹

提 要 文章分析了两种现象：1. 甘肃—青海地区汉语和非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繁杂的语音形式；2. 西北地区某些汉语方言里“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用法。甘青地区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除了“他”，还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来源于不同的非汉语言。非汉语言之间也相互借贷，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实体借贷的网络。西北个别地区“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用法渊源深远，应该是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在不同时期影响汉语的结果。现在在陕北地区看到的现象大概是模式借贷了上述非汉语言。今天的唐汪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初期阶段，两种借贷方式可能并存。

关键词 第三人称 西北地区 实体借贷 模式借贷

一 引言

人称代词是语言里的核心词汇，但是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的地位是很不一样的。在语言学界通用的 Swadesh 的核心词表里，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在前 100 词表里居首要地位，而第三人称代词在后 100 词表里才出现。这从侧面说明，这三个人称代词在人类语言里的地位是有区别的。因为人类语言在交流时，“我”和“你”自然是通常的对话人，而第三者“他”可有可无，可在可不在，完全不影响语言交流。指示代词在前 100 词表里紧跟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其地位也是异常突出的。语言学家们早已发现，指示代词在很多语言里经常代替第三人称代词。^① 很多语言里的指示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同形，有的语言里的第三人称代词是从指示代词演化而来的。中国境内许多学者都研究过第三人称代词和指代词的关系，仅近二十年就有张惠英（2001），邢向东（2001），唐正大（2005），雒鹏（2006），张维佳、张洪燕（2007），史秀菊（2010），刘勋宁（2013），汪化云（2013、2016）等学者的专著或

* 本研究得到欧洲科学研究基金委员会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 提供的 Horizon 2020 ERC-2019-AdG 883700-TRAM 项目的资助。笔者对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表示诚挚的谢意。

① 匿名审稿人提出“应该是第三人称代词由指示代词发展而来”，这一观点可能有些片面，比如 Kotwicz (1936: 16)、Janhunen (2003: 19) 都曾指出，早期蒙古语里“原有的第三人称代词被指示代词替代了”。

文章。Bhat (2013) (WALS <https://wals.info/feature/>) 提供了一个 225 个语言的统计。其中 100 个语言里的指示代词和第三人称毫无关系, 125 个语言里两者有关联。^①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 指示代词的核心地位比第三人称高许多。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里的指示代词都和第三人称代词通用; 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也是晚出, 古汉语里的指示代词也用于第三人称代词, 如“彼、之”等。关于这一点, 许多学者早已指明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1985: 187), 今天这些都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了, 恕不举例。

本文的重点是要梳理西北甘肃—青海一带第三人称代词繁杂的用法, 探讨“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用法。这些用法不是从天而降的, 若仔细观察都能追溯到其来源。我们看到, 西北上述用法来自非汉语, 而不是古汉语的遗留或演变。本文研究西北汉语方言, 同时密切关注非汉语, 试图追寻各语言之间接触的历史层次。这些来源历史层次不同, 但基本都对应对应当地不同群体接触、融合的历史。语言之间的相互借贷是很正常的事情。语言学家把语言之间的借贷分为至少两种形式, 一种是实体借贷 (matter borrowing), 另一种是模式借贷 (pattern borrowing)。请参见 Matras & Sakel (2007: 841)、Sakel & Matras (2008: 68)。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近些年常用这两个术语, 因为较之过去的术语, 这两个术语表达更简洁、明了。^② 我们将通过这两种借贷形式探讨西北汉语里第三人称代词以及第三人称领属后缀。

第二节将从第三人称代词不同的语音载体探讨其来源。很多形式属于语言之间的实体借贷, 属于一种表层的借贷, 时间深度可深可浅, 但不会影响一个语言的类型或本质。第三节将从第三人称在句法上的特异表现来观察。这种句法上的借贷属于模式借贷。这种借贷属于深层借贷, 语音形式与源语言完全没有共同点, 时间也是可近可远。如果这种模式借贷只限于某个表达方式, 那么句法的根本不会被撼动。但如果这种句法上的模式借贷堆积多了, 完全可以动摇一个语言的句法根基。这在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内已经展现得很清楚了 (徐丹 2018a、2018b)。

① 在 125 个语言里, 该作者又做了细分, 在 73 个语言里, 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在距离、指代名词的性、生命度方面有关联。

② 请参见 Sakel (2007)、Gardani (2020) 的文章。在语言接触理论方面, Weinreich (1953) 开了先河, 近几十年 Thomason & Kaufman (1988) 和 Thomason (2001) 的著作被视为经典著作。书中不乏精辟的论述。上述作者区分“借用” (borrowing) 和“转用” (shift)。这两个术语其实包含诸多附加条件和层次, 很难概括和描述时间尺度很深的语言现象。再比如这些作者 (1988: 74) 制定了借贷等级 (borrowing scale), 在理论上讲是很好的借鉴标准, 但在实际的语言借贷中, 总有跨等级、不符合其等级标准的现象。Thomason & Kaufman (1988: 71) 通过实例也指出, 乌兹别克和塔吉克语言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借用和转用是同时发生的; 英语曾大量借用法语词汇, 也是借用和转用同时发生的 (Thomason 2001: 72)。我们认为 Sakel (2007) 等人的分类向前又进了一步。本文采取 Sakel (2007)、Matras & Sakel (2007) 的分类及术语。

二 西北汉语及非汉语言中的第三人称代词

在中国版图上的各个汉语方言,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各自有一套表达方式,并且体系内部很一致,古汉语的来源也展示得很清楚(请参见曹志耘 2008 年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在西北非汉语言里,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形式也是各有一套,内部很系统,并都带有明显的本语族语言的共享特征,历时脉络一目了然,各个系属井然不乱。唯有第三人称,不论在汉语各方言还是非汉语言,都是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从繁多的形式中,仍然可以追溯其不同的来源。这是因为没有一个用法是独立突然而形成的,都与周边的语言或曾经邻近的语言有历史瓜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有的方言/语言与地理位置较远的方言/语言反而显示出密切的关联。

2.1 西北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举例

现在我们观察一下西北汉语里第三人称代词的表现形式。

甘肃临夏方言: tɕiə^{243} , $i^{42} \text{tɕiə}^{243}$, $\text{vu}^{42} \text{tɕiə}^{243}$, 兀个, 他(“兀”在临夏话里也是远指代词)

(1) tɕiə^{243} 城里没去者。(《临夏方言》1996: 177)

他没有去城里。

(2) $i^{42} \text{tɕiə}^{243}$ 的阿达叫来了。(同上: 178)

他父亲叫他回家。

(3) $\text{vu}^{42} \text{tɕiə}^{243}$ 韩集去了。(同上: 178)

他去韩集了。

(4) 兀个收拾着干干散散的。(杜冰心 2012: 45)

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5) 他把妈妈撞翻了。(张强 2021: 70)

甘肃唐汪话: 呢, 他(“呢”也用作指示代词)

(6) 呢 (nə) 我哈有意见哩木?(徐丹 2014: 244)

他对我有意见了么?

(7) 她再不见。(徐丹 2014: 360)

她不要见(她过去的丈夫)。

青海西宁话: 傢

(8) 傢的工资我哈高哈着。(王双成 2009: 242)

他的工资比我的高。

青海甘沟话: aijie, 暖傢

(9) aijie-zhi yatou liangge-ha jiao-zhi lai-liao bai. (Zhu *et al.* 1997 : 444)

aijie-之丫头两个 哈叫着来了 呗
他的两个丫头叫来了。

(10) 暖傢啊衣裳少。(杨永龙 2014 : 233)

他衣服少。

青海循化话: tɕiɛ, 他

(11) 他 [tɕiɛ] 我 [ŋa] 哈也打了一挂, 我 [ŋə] 他 [t'A] 哈噉的了一顿。(尹龙 1985 : 107)

他也打了我一下, 我骂了他几句。

(12) 人家们书看是, 他 [tɕiɛ] 玩着哩。(马伟 1994 : 70)

别人在看书, 他在玩。

青海周屯话: 阿吉 atɕi, 箇 kur (“箇”也是指示代词), 他^①

(13) 阿吉庙上有。(Zhou 2022 : 121)

他/她在庙里。

(14) 你箇啊打。(同上: 70)

你他-宾格打

你打他/她!

(15) 三十晚夕我的阿奶他馍馍要去了说哩^②。(同上: 156)

年三十晚上, 我奶奶她要馍馍去了。

青海刘屯话: ǎ¹¹tɕi⁵⁵, 固 (远指代词是“固个”或“兀个”), 他

(16) ur²⁴ ǎ¹¹tɕi⁵⁵ xa fɿ¹¹xa¹¹lo⁵⁵ (孙凯 2011 年田野调查记录)

我 俺己 哈 输下了
我输给了他。

(17) ur²⁴ tɕ⁵⁵ tʰa¹¹-la⁴⁴ i¹¹ta⁵⁵ tsu¹¹ (同上)

我 带 他-伴随格 一搭 走
我和他一起走。

(18) 我昨个固他啊见了。(马梦玲 2019 : 251)

我昨天见他来着。

① Zhou (2022) 认为周屯话的“他”早期是第三人称代词, 后受藏语影响而形成新的用法, 即所谓“言者指称代词”(locutor-referential pronoun)。

② 此处的“说哩”是讲故事者串联句子的惯用语。

青海五屯话: gu(gu 也是指示代词), 他

(19) gu-ha e-di-li (Janhunen *et al.* 2008 : 63)

他-哈 饿-地-哩

他饿了。

(20) ta zang-ge jja-la qhi-zhe sho-ma... (Sandman 2016 : 70)

他 藏-REF 参观-条件 去-着 说-REF

他说他要去西藏……^①

以上甘青一带汉语方言或变体里的第三人称变化多端,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四个类别或系统。1. 他; 2. 呢(那); 3. *teiə*类(包括变体 $i^{42} teiə^{243}$, $vu^{42} teiə^{243}$, *aijie*, 噯傢, 阿吉 *atei*, 俺己 $\tilde{a}^{11} tei^{55}$); 4. 兀类(包括变体 *gu*, 箇 *kur*, 固)。第一类是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 遍布全国各个方言, 第一类不用再讨论。第二类是世界语言里常见的现象(见第一节近期学者的研究以及下一节的例子), 也是汉语方言里常见的现象, 即用指示代词代替第三人称代词, 或两个形式通用。除上述例子外, 北方不少地方方言第三人称代词是由指示代词承担的, 如陕北的神木、绥德、清涧用“那”作为第三人称单数。第三类(*teiə*类)和第四类(兀类)显然不是古汉语的遗留或演变, 需要从这些汉语方言的周边语言寻找答案。我们先介绍非汉语的语言材料, 再比较汉语和非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有的结果会一目了然, 有的还需要辨析才能看清。

2.2 西北非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举例

我们把甘肃—青海非汉语言的第三人称按照所属语族排列出来, 例句从略。

甘肃东乡语: 东乡语属于蒙古族语言。第三人称代词是 *tərə*, 这显然与蒙古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 *ter* 是一脉相承的。刘照雄(1981 : 51)指出, 东乡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经常被指示代词 *hə* 代替。^②

保安语: 保安语又分甘肃保安语和青海保安语, 也属于蒙古族语言。根据陈乃雄(1986 : 171)的研究, 保安语除了像蒙古语那样用指示代词 *enə*(这个)、*tərə*(那个)表示第三人称外, 还有一个“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在甘肃的大墩是 *ndzɑŋ*, 干河滩是 *ɬzɑŋ*; 在青海的年都乎话里是 *əɬzɑŋ/ɑɬzɑŋ*, 在保安下庄、尕洒日是 *ndzɑŋ*, 郭麻日话里是 *əɬzɑŋ*。

甘肃东部裕固语: 东部裕固语属于蒙古语语族的语言。保朝鲁、贾拉森(1990 : 215)还提到, 东部裕固语里的 *ndzen* 既表达“主人”义, 又是反身代词和第三人称代

^① Sandman 标注的 REF (referential), 指说话人有所指的动词或名词。请参见她的定义 (Sandman 2016 : 145)。

^② 根据布和(1986 : 131), 除了 *tərə*, 东乡语里还有一个第三人称代词形式 *əxən*。但笔者在实际语料中暂时未找到。

词。Nugteren (2003 : 273) 指出, 第三人称代词是由指示代词 ene(这)、tere(那)担任的。其中 tere 更常用。他还提到另一个形式的第三人称代词 ergen(他/她)。

青海土族语: 根据 Georg (2003 : 298) 的研究, 互助土族语的指示代词 ne(这)、te(那)用来充当第三人称代词。土族语有一个常用的、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 (special third person personal pronoun) gan(他/她), 更早的形式是 rgen/rgan。在 Slater (2003 : 314) 的描述里, 民和土族语的第三人称形式是 gan。有意思的是, 在照那斯图 (1981) 的《土族语简志》里, 只提到了指示代词代替第三人称的两个形式, 而未提到其他学者说的另外两个第三人称代词形式及其变体。

甘肃西部裕固语: 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根据裕固族学者钟雪晴 (Zhong 2019 : 238) 的研究, 明花乡的第三人称代词是 go/gu(第三者在场)或 o/a(第三者不在场); 大河乡的第三人称代词是 o/a(第三者在场)。西部裕固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完全同形(同上)。

青海撒拉语: 撒拉语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根据林连云 (1985 : 51) 的研究, 撒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同形, 都是 u, 表达“他/她/它”。

安多藏语: 青海地区的藏语方言主要是安多藏语。根据 Dpal ldan bkra shis (2016 : 2) 的著作, 安多藏语里的第三人称是 k'erge(他)、mørge(她)。这与 Robin (待刊 : 108) 的记录相同, 后者指出 k'ong 是第三人称尊称。

上述非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形式也是繁多甚至显得有些复杂, 但是仔细观察还是能够发现基本上也可以分成五个系统: 1. ter 系统 (tərə, tere, te); 2. dzan 系统 (ndzan, ɛdzan/ɑdzan, ɛdzan, ndzen); 3. gan 系统 (rgen/rgan, ergen, erken, ɛkən); 4. u 系统 (go/gu, o/a) 以及 5. k'erge (k'ong)。

第一个系统也无需多费笔墨, ter 是蒙古语族诸语通用的指代词, 与第三人称代词通用, 以至于许多语法书在论述代词系统时, 只对第一、第二人称以及指示代词进行描述, 不给予第三人称代词任何地位。第五个系统是当地安多藏语特有的, 暂时看不到与我们讨论的甘青语言区域内的其他第三人称代词有关联。我们重点要讨论 2、3、4 几个系统。

2.2.1 dzan 系统 (ndzan, ɛdzan/ɑdzan, ɛdzan, ndzen)

对这一语音形式, 蒙古语族的专家学者曾有所讨论。如保朝鲁、贾拉森 (1990 : 214—215) 就曾提出, 东部裕固语的反身代词 edzen 和土族语的反身代词 ndzen 语源应来自蒙古语的 ejen [edzen] (主人)。他们还进一步推测, 形式虽然来自蒙古语, 但是意义却和藏语的 bdag (主人) 是一致的。他们认为, 表示“主人”意义的词能够表达人称代词是受藏语影响的结果, 因为藏语该词能表达“主人、我、自己”三种意义。他们虽没有用今天的术语, 但是已经指出这是一种模式借贷, 即语音形式不同, 但意义和语法

作用相同。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比如保朝鲁、贾拉森(1990:213)注意到,东部裕固语里的反身代词 *edʒen* 可以在间接引语里做第一人称代词使用,这就和藏语的用法如出一辙了。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模式借贷。同一个词在别的语言如土族语、保安语转用为第三人称代词。*edʒen*(主人)的词源是蒙古语,*edʒen*表示“主人”意义的词已见于《蒙古秘史》。可以说,甘青语言区域内的蒙古语族诸语的 *ɖʒaŋ*, *ndʒaŋ*, *ɵɖʒaŋ/ɑɖʒaŋ*, *əɖʒaŋ*, *ndʒen* 都是蒙古语 *edʒen* 的变体,在这些语言里表达第三人称。

2.2.2 gan 系统 (*rgen/rgan*, *ergen*, *erken*, *əxən*)

对这一形式的来源, Nugteren (2003:273) 认为东部裕固语里的 *ergen* 可能来自蒙古语的 **irgen*(人民)。Georg (2003:298) 也持此观点,认为互助土族语里的 *gan* 可能来自 **irgen*(人民)。他认为也有可能来自更早的形式 *rgan/rgen*(别人、他人)。Slater (2003:314) 没有明说民和土族语里的 *gan* 的来源,但他用箭头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gan* < **irgen*(人民)。布和(1986:132)认为东乡语里的 *əxən* 应该和土族语的 *rgen*、保安语的 *ŋgaŋ* 以及东部裕固语的 *ergen*(尊称)是同一个来源。斯钦朝克图先生(待刊)也认为,第三人称 *erken*^① 在东部裕固语里是“他、她”的尊称。

我们认为, *gan* 是 *rgen/rgan*, *ergen*, *erken* 的变体,笔者窃以为,这个词应该借自藏语的 *rgan*, 即这些变体形式的最初形式应该是 *rgan/rgen*, 拉萨语音是 *gan*, 在安多藏语里头置字 *ra* 要念出来,发音是 *rgan*, 这个语素的意义是师长、先生、老者^②, 在藏语里“老师”是 *ge-gan*, 也包含这个语素, *gan*+ 名词,还可以表示“年迈、老”的意思。我们认为这个词的借贷路径是藏语里的 *rgan*> (> 借入到)蒙古族诸语后演变为 *rgen/rgan*, *ergen/erken* > 继而简化为 *gan*。意义由“师长、老者”转用为第三人称或尊称的“他”。*gan* 是这些变体的简化形式。笔者(徐丹 2018a:12)曾经指出“借用语言在从源语言进行实体借贷时,常常简化原有的语音形式”。

2.2.3 u 系统 (*go/gu*, *o/a*)

笔者认为这个系统应属于突厥语族语言。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很好地承袭了古突厥语。在8世纪古突厥语的碑文里,第三人称代词主格是 *ol*。中国境内各个突厥语都沿用了这个词,有的用 *ol*(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儿、图瓦);另一些用 *u*(如维吾尔、乌孜别克、撒拉)^③。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第三人称代词的主格是 *o*。在西部裕固语里见到的变体形式是 *go*, *gu*。

审稿人认为,突厥语在甘青一带影响较小,应该考虑汉语语音演变的情况,“在甘肃陇中片和秦陇片一些方言里一等疑母字读 [k] 母,应该是存古现象”。笔者感谢审稿人

① 本文引文记录音标时全部遵从原作者,不予改动,如 *k/g* 等。

② 请参见耿显宗等(2006)《安多藏语口语词典》,202页。

③ 请详见陈宗振、努尔别克、赵相如等(1990)。

这一富有建设性的建议。^①饶有兴味的是，甘肃的指代词“兀”并未发生这一音变，个别第一人称代词“我”发生了这一音变。雒鹏主编（2021）的著作介绍了甘肃41个调查点，在定西市和天水市交界的地段^②发现第一人称代词“我”发生了这种音变，如秦安、甘谷、武山、通渭、陇西、漳县，在这六个地方，第一人称代词“我”的辅音由疑母字演变为见母字。在41个调查点里，有12例指代词“兀”，却无一例疑母字演变为见母字的例子。所以这些实例很难支持青海五屯、周屯和刘屯“兀”的变体“固”是由疑母字演变而来的，也很难说明“兀/固”的用法是古汉语的存古现象。

2.3 第三人称代词用法综合比较及分析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甘青一带汉语方言及其变体特有的第三人称代词形式和当地非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形式，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甘青一带汉语里这些第三人称，是当地汉语才有的特殊形式。请看下表里的综述对比：

表1 非汉语言的 *ɕaŋ* 系统和汉语的 *teiə* 系统

非汉语言	<i>ndzaŋ, ɕɕzaŋ/aɕzaŋ, ɕɕzaŋ, ndzen, ɕzaŋ</i>
汉语方言	<i>i⁴² teiə²⁴³, vu⁴² teiə²⁴³, aijie, 唛傢, 阿吉 atei, 俺己 ǎ¹¹tei⁵⁵, teiə, 傢</i>

表2 非汉语言的 *u* 系统和汉语的 *兀* 系统

非汉语言	<i>u, o/a, go/gu</i>
汉语方言及其变体	兀, <i>gu</i> , 箇, 固

两相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出，甘青一带汉语方言及其变体里不同的第三人称代词来源于非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形式。汉语方言里这些不同的语音形式和变读基本属于实体借贷。如表1里汉语方言里的“唛傢，阿吉，俺己，傢”等应当来自当地蒙古语族语言的 *ɕaŋ* 系统，虽然发音和记录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主要音节的辅音和元音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相似性，其语义、句法功能完全一致。汉语方言借入这些代词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简化鼻韵尾。这一特点不是今天才有的语音特征，龚煌成（2004：301）等学者早已指出12世纪的西北方音已经失去了鼻韵尾 *-ŋ*。从高田时雄（Takata 1987：98）转写的敦煌变文里藏汉对文，我们看到，在9—10世纪时，藏文记录的西北方言里的“经”都已失去鼻韵尾 *-ng (-ŋ)*，均记作 *kyi*，所以汉语方言里的语音形式都缺鼻韵尾 *-ŋ* 应属正常现象。今天西北方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前后鼻音不分。

① 在此，笔者向邢向东先生和雒鹏先生特表谢意，他们为笔者提供了关于甘肃方言里疑母演变为见母的例证和参考文献。

② 关于这个问题，也请读者参考雒鹏先生（2006）另一篇文章的调查结果。

《临夏方言》(1996:177)的作者们指出:第三人称单数汉腔念 tɕiə^{243} , 回腔念 $i^{42} \text{tɕiə}^{243}$, 回腔少用 $\text{vu}^{42} \text{tɕiə}^{243}$ 。可以看到,临夏方言的第三人称代词比任何地方都丰富,共有5种形式。除了汉语的“他”,有蒙古语族借来的 ɬaŋ 系统,还有突厥语族的“兀”系统,甚至混合了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两个系统,如 $\text{vu}^{42} \text{tɕiə}^{243}$, vu 来自突厥语的 u 系统,而 tɕiə 则来自蒙古语的 ɬaŋ 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临夏是甘青语言区域内语言接触的中心地带,当地回族的双语者或多语者在语言混合和融合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Xu 2021:160—161)。

表2呈现的特征是突厥语族语言的特征。五屯话里的 gu , 周屯话里的“箇”,刘屯话里的“固”和“兀”应当来自突厥语的影响。“箇/固”和“兀”是变体关系。 $u/gu, o/go$ 这种变体形式常出现在阿尔泰语言的记录中,如 Daur(达斡尔)既可以写为 Daur,也可以写成 Dagur/Dagor。这种变体关系还反映在研究者的记录里,如马梦玲(2019:251)指出,刘屯话的远指代词为“兀个” $[\text{o} \text{kə}]$ 或“固个” $[\text{ku} \text{kə}]$ 。

从现有的记录看,我们暂时没有发现甘青汉语方言里有 gan 系统($rgen/rgan, ergen, erken$)。汉语借入第三人称代词后发生了简化现象,非汉语也有类似情况。总体来说,这一地区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的借贷是实体借贷,语音上基本都能找到蛛丝马迹。

蒙古语族诸语里的 gan 系统来自藏语的 $rgan$ 。语音形式来自藏语,属于实体借贷。 ɬaŋ 系统语音形式来自蒙古语,与藏语无关,但意义上是模拟藏语的用法。所以这个系统的第三人称代词可以说是模式借贷。

三 第三人称的领属后缀

笔者对第三人称领属形式的好奇是从调查唐汪话开始的。唐汪话第三人称领属形式可以是“名词+ni”, $-ni$ 只能用于第三人称的领属意义, $-ni$ 前面的名词是被领属者,而不像汉语里那样是领属者。如“阿大ni”是“他的爸爸”的意思,而不是“爸爸的”意思。吕珊珊曾口头告诉笔者,《兰州方言》(兰州大学中文系1963)里也有类似的记录。前不久(2022年11月16日)刘勋宁先生也告诉笔者,他的家乡话——陕北清涧话也有这种特殊的领属表达方式。^①这意味着,这种句式在北方汉语里不是孤例。本来笔者只见到唐汪话、兰州话的例证,现在看来这种现象应该比报道的多,还有待于挖掘。2022年11月26日由云南玉溪师范学院组织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五届年会的网上报告中,张军给出了不少陕北横山话的例证。下面唐汪话的例子是笔者调查所得,兰州话的例子是《兰州方言》里见到的,清涧话的例句是由刘勋宁先生提供的,横山话的例句是张军

① 在此,笔者向两位学者致谢,诚挚感谢他们的分享。

报告里列举的。

唐汪话：

在唐汪话里，表达“他的书”有三种用法（徐丹 2014：235）：

- (21) a. 呢底书 [nə tɛi ʂu]
 b. 呢底书 ni [nə tɛi ʂu ni]
 c. 书 ni [ʂu ni]

这三种表达方式都是“他的书”的意思。(21a)是汉语结构“他+的+书”；(21b)是混合句式，在“他的书”后面加上了第三人称领属标记 -ni。(21c)彻底是东乡语或蒙古语的句式，即“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唐汪话(21)里的第三种用法和东乡语的表达如出一辙。

研究唐汪话第一人陈元龙（阿·伊布拉黑麦）先生在其文章（1985：38）里给出的例子是：

- (22) ʃifuni, 媳妇 -ni(他的媳妇)

这种表达方式在甘肃兰州话里也有过报道。

兰州话：

兰州话的例句出自《兰州方言》（1963：137）。原文如下：

但是“的”还有一个特殊用法，能放在称谓名词后面，表示第三身领格。比如：“妈的”就是“他的妈”，“老师的”就是“他的老师”，“儿子的”就是“他的儿子”。

请看作者给的例句（页数同上）：

- (23) 妈的连一句话没有说，就断了气了。（他妈连一句话没说，就断气了。）
 (24) 哥哥的把他拉扯大了。（他哥哥把他抚养大了。）
 (25) 秀英到引洮工地上看爱人的来了。（秀英到引洮工地上看她爱人来了。）
 (26) 一到晚间会，就想起奶奶的了。（一到晚上，就想起他奶奶了。）
 (27) 把姐姐的送走了。（把他姐姐送走了。）

这些作者们还说，这种用法“只能做主语和宾语，同时，也不能加上任何修饰成分”。后来关于兰州方言第三人称代词研究的报告里，未见这种用法的记录。如何天祥（1986：87）只谈到兰州方言里有“他”和“那”（“那”发音 nay/lay）做第三人称代词。雒鹏（2006）、张巍（2013）等，以及近期关于兰州话的硕士论文，无一谈及兰州话里这种特别的领属表达的用法。几部硕士论文里的领属表达和普通话语序一样，如“他爸”（余丽 2015：17—18）、“那（他）大娘”（丁一欢 2015：21）、“他的哥哥”（杨欣 2021：29）。不知道是否由于兰州近几十年语言发生了变化，这种用法消失了。很显然，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这种用法还完好地保留着，如陕北地区的两个相距不远的方言：

清涧话和横山话。

清涧话:

现在我们看看清涧话的例子。这是刘勋宁先生 2022 年 11 月 16 日为笔者提供的。

- (28) 妈妈的(他妈)
- (29) 儿的(他儿子)
- (30) 爷爷的(他爷爷)
- (31) 媳妇的(他媳妇)
- (32) 队长的(他们队的队长)

横山话:

请看张军的例句(见于 2022 年 11 月 26 日的报告):

- (33) 那老子的是个老师。(他爸爸是一位老师。)
- (34) 那些儿的我认得叻。(他家的儿子我认识。)
- (35) 姐姐的给那买了台电脑。(他的姐姐给他买了一台电脑。)
- (36) 人家舅舅的可有钱叻。(他们的舅舅非常有钱。)
- (37) 小明爸爸的是公务员。(小明的爸爸是公务员。)

上面提到的唐汪话、兰州话、清涧话和横山话里这种用法有一个共同的限制,即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不能用在在这个结构里,只能用第三人称代词。所领属的成分在兰州话、清涧话和横山话里只能是亲属称谓,横山话里这个限制略为宽泛,有时可以用于“关系密切的人”。刘勋宁先生还特地说明,清涧话里的这一用法只能用于亲属称谓,不能用于别的地方,比如不能把“他的棉袄”说成“*棉袄的”,把“他的脚”说成“*脚的”。在清涧话里不能成立的词组在唐汪话里可以说,如“棉衣 -ni”(他的棉袄),“脚 -ni”(他的脚)。^①即唐汪话里所领属的成分不限于亲属称谓,可以是亲属称谓以外的其他名词。

四 第三人称代词特殊领属表达的可能来源

上面谈到的甘肃唐汪话、兰州话以及陕北的清涧话、横山话有明显不同的句法限制。唐汪话里这种用法像东乡话一样不限于亲属称谓,但这种用法在唐汪话里只限于第三人称单数领属,唐汪话里第一、第二人称没有这种用法。而其他方言如兰州话、清涧话除了限于第三人称以外,只能用于亲属称谓。^②东乡语像蒙古语一样,名词后面可以有三个不同的人称领属后缀,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形式是 -ni。唐汪话里的 -ni 很可能是

^① 这是笔者核实例句时,唐汪人汪小嫻告诉笔者的,在此向她表示谢意。

^② 从张军的报告看到,横山话的限制略松,可以用于“师傅、同学”。

从东乡语借入的，但简化了形式，即只有第三人称领属后缀了。唐汪话被属于蒙古语族的东乡语影响了几百年，当地汉人受到东乡人的深刻影响，几百年前，大部分从信奉道教、佛教转向信奉伊斯兰教了。^①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和当地的东乡人通婚、相濡以沫几百年，语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唐汪话里这种第三人称的领属用法来源很容易理解。

4.1 现代通古斯语、蒙古语及突厥语

我们看到，现代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都用三个人称的领属后缀指明领属关系。但在细节上有所差别。有的语言具有三个人称不同形式的领属后缀，有的语言只有第三人称有领属后缀。现在我们看看活的例证：

锡伯语：(李树兰、仲谦 1986 : 50)

(38) əni-ni, 母亲—他的 (他的母亲)

(39) xəxə-ni, 妻子—他的 (他的妻子)

锡伯语也可以用“指示代词领格 + 名词 + 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形式，如：

(40) tərəj du-ni, 那的 弟弟—他的 (他的弟弟)

鄂尔多斯蒙古语：(Georg 2003 : 202)

(41) bagsi-ni, 老师—他的 (他的老师)

喀尔喀蒙古语：(Svantesson 2003 : 165)

(42) ger ni, 房子—他的 (他的房子)

喀尔喀蒙古语里名词后可以加上三个人称不同形式的领属后缀。例子略去。

东乡语：

(43) mori-ni, 马—他的 (他的马) (刘照雄 1981 : 44)

(44) awəi-ni, 父亲—他的 (他的父亲) (布和 1986 : 106)

保安语：^②

(45) abo-nə, 爸爸—他的 (他的爸爸) (布和、刘照雄 1982 : 33)

(46) muzi-nə, 猫—他的 (他的猫) (陈乃雄 1986 : 125)

土族语：(照那斯图 1981 : 22)^③

(47) morə-nə, 马—他的 (他的马)

① 比如唐家清真大寺建于 1465 年，汪家清真大寺建于 1682 年。我们从这些年代可以窥见当地唐汪两大家族何时皈依了伊斯兰教。

② 布和、刘照雄 (1982 : 32) 两位作者还特地指出，保安语不像其他蒙古语那样有三个人称不同的领属后缀，保安语只有第三人称领属后缀 -nə。

③ 照那斯图 (1981 : 22) 也特地说明，只有第三人称领属后缀常用。我们可以认为保安语和土族语简化了通用蒙古语的系统，即保安语和土族语里的这种用法是后于其他蒙古语如喀尔喀蒙古语而形成的，保安族和土族是 14 世纪至 16 世纪形成的 (请参见周伟洲 2004)。

(48) aama-nə, 妈—他的(他的妈妈)

撒拉语:(林莲云 1985)^①

(49) aba-si, 父亲—他的(他的父亲, 39页)

(50) avo-si, 男孩—他的(他的男孩, 42页)

撒拉语里也可以用“第三人称领格+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句式,如:

(51) aniyi bala-si, 他的一小孩—他的(他的小孩, 72页)

从上面的例句我们清楚地看到,北方现代非汉语毫无例外地都用附加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方式表达第三人称领属。

4.2 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对北方汉语的影响

如果说唐汪地处东乡语的包围,产生了实体和模式借贷很好理解,那么和甘青这些非汉语没有明显关联的陕北方言里的用法如何解释呢?

兰州和陕北地区(北方可能还有其他地区未予记录)的句式来源可能历史就不止几百年了。甘青地区的各个语言形成时期有比较明确的历史记载和民间流传的记录,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基本都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形成的(请参见周伟洲 2004)。文少卿前几年对唐汪人的基因成分的研究(Xu & Wen 2017)也证实了唐汪人居住甘肃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但是北方黄河流域以北,更确切地说,长城以北的地区从来都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峙之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北方各游牧部落和中原农耕人群始终有摩擦、碰撞、争夺,甚至战争。在北方遗留下来的某些词汇乃至表达方式都留下了操不同语言人群的痕迹。^②中国北方由游牧人群、半耕半牧群体、渔猎群体建立的政权有北魏(鲜卑)、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除了这些朝代,其他的还有大小不一的非汉王朝曾在北方突起,如柔然(阿瓦尔)、突厥、吐谷浑、回鹘、西夏(唐古特)等也都是北方游牧部落或以游牧为主的人群建立的政权。

我们认为陕北或北方其他地方的这类用法是历史上某些人群语言的遗留。尤其是讲阿尔泰诸语^③的人群留下的痕迹。这就有必要挖掘已知的早期文献记录。关于阿尔泰语系的说法是否成立,在语言学界一直没能解决,原因就是缺少早期语料。有两个语料被研究得比较充分,如8世纪鄂尔浑河流域的古突厥文碑文和13世纪的《蒙古秘史》,我们从中找到了一些例证。鄂尔浑碑文使用鲁尼文字镌刻而成。例子来自Tekin(1995)转写的拉丁文字的材料。《蒙古秘史》的例子来自额尔登泰和乌云达赉(1980)校勘的版本。

① 撒拉语的第三人称领属后缀在辅音后是 -i/-l, 在元音后是 -si/si。本文引用时原作者的音标照录。

② 比如北方通行的“波罗盖(膝)”一词就是通古斯语言的遗留(徐丹 2021)。

③ 本文只用“阿尔泰语”这个术语,其中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但是这些语言是否有共同的祖语,以至形成一个“语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8 世纪鄂尔浑碑的古突厥文

根据 Tekin (1968), 耿世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1999) 等学者的研究, 鄂尔浑流域的古突厥文里三个人称领格、领属后缀俱全, 第三人称领属后缀是 -i/-ı、-si/sı。前面撒拉语的例子以及今天的土耳其语仍然如此。请看古突厥鄂尔浑碑文中的两个例子:

(52) bodun-ı, 百姓—他的 (他的百姓, 阙特勤碑 Kül Tighine, 南 6, Tekin 1995 : 36)

(53) sü baş-ı, 军队—头—的 (军队的头阵/先锋, 墩欲谷 Tounyouqouq, 东 7, Tekin 1995 : 88)

13 世纪《蒙古秘史》的例子

Kotwicz (1936 : 16) 早已指出, 今天活着的蒙古语各方言里的第三人称领属后缀 -ni>ń 来自早期蒙古语的 inu(>*ini) 或 anu。研究蒙古语的学者都认为 inu, anu 这两个词在《蒙古秘史》里是常用的语法词, inu 是第三人称领格或领属后缀单数形式, anu 是第三人称领格或领属后缀复数形式。现在我们看几个例子。在《蒙古秘史》里, inu 用“亦讷”记录, anu 用“阿讷”记录。

(54) 额客亦讷, 母亲—他的 (他的母亲, 20 节, 18 页)

(55) 额客阿讷, 母亲—他们的 (他们的母亲, 22 节, 21 页)

(56) 兀鲁思亦讷, 百姓—他的 (他的百姓, 166 节, 355 页)

(57) 亦讷斡乞, 他的一女 (他的女儿, 61 节, 64 页)

(58) 阿讷兀^𑖅鲁^𑖅, 他的一亲 (他们的女儿, 165 节, 352 页)

(59) 格^𑖅儿帖^𑖅儿干亦讷, 房子—车子—他的 (他的房子、车子, 121 节, 203 页)

(60) 兀鲁思亦^𑖅儿坚阿讷, 国—百姓—他们的 (他们的国人、百姓, 154 节, 327 页)^①

从书中例句我们看到, 第三人称单数领属后缀用“亦讷”(例 54、56), 复数用“阿讷”(例 55、60); “亦讷”“阿讷”也可以用于第三人称领格(例 57、58)。“阿讷”的出现频率比“亦讷”少得多, 书中译者把“阿讷”译为“他的”, 看来区别并不是那么严格。

我们看到, 阿尔泰诸语言都用领属后缀配合领属格。领属关系清楚时, 领属后缀已足以表达领属关系时可以用不用领格。北方汉语一些方言“名词+领属后缀”的用法, 不是来自古汉语, 而是来自曾经操阿尔泰诸语的非汉人群。很难说陕北方言里的这种用法

^① 校刊本里“兀鲁思”逐字对译一般译作“百姓”, 例(60)里逐字对译为“国”。逐字对译里, “阿讷”被译为“他的”。“他们的”是笔者的译文, 不是校刊者的译文。

具体是哪个时代、哪个语言的影响,历史上通古斯语、突厥语、蒙古语都在不同时期对北方汉语有过深刻的影响,这些群体在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表达方式上出奇地一致,只不过在汉语方言里大大简化了。也就是说,过去三个人称的系统被简化成一个人称,即第三人称。继而又简化成只限于亲属称谓。这些都符合语言在借贷时变化的规律,即“在进行模式借贷时常常简化原有的系统”(徐丹 2018a: 12)。

陕北的历史厚度很深。中国历史上一直在改朝换代,中国北方是北方汉和北方非汉接触、碰撞的前沿,也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陕北人群杂居、共处久矣。周伟洲(2015)指出,陕北曾经是匈奴(尤其是南匈奴)、鲜卑、西域胡人、关中羌人、杂胡等的居住地。通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分子人类学家研究的进展,我们看到他们和汉人不断融合又不断形成新的语言团体。这些非汉群体也是互相同化、融合。蒙古人的突厥化和突厥人的蒙古化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从鄂尔浑碑文和《蒙古秘史》我们清楚地看到,部落之间战争的胜利品之一就是人口,即讲不同语言的部落随时可以融合在一起,也可以随时又融入新的胜利者的部落。由于不断地兼并、融合,这些北方语言在许多句法表达上也很相似,导致不少学者认为它们的祖先语言同源。

中国北部近几百年的历史主流是汉化,但是也伴随着部分地区的胡化,汉人和这些非汉人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层层积累的某些表达方式很难说是某个语言或某个语族的语言影响了当地的汉语方言。今天看到的当地语言是层层叠加的结果,是在不同时期受到了不同语言的影响或互相影响而逐渐形成的。现在,陕北汉人的汪洋大海已稀释了本来人数就少的不同族群。可以想象,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各种群体融合时期,某些个体或群体在汉化时不经意地保留了自己语言里的某个句法形式,另一些个体或群体接受了“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这一用法,可能是模式借贷,也可能是实体兼模式借贷(如今天的唐汪话),继而又根据自己的母语进行了部分改造。这种由于历史、政治、经济原因导致的民族融合、群体重组,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语言上。

五 初步结论

文章讨论了第三人称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这一用法的形式在甘青一带变化丰富,但都有源可寻。第二种是作为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用法,这一用法虽然不普遍,但地域范围显然更大,时间深度更久远。通过前面的例子我们看到,实体借贷和模式借贷可以同时发生:唐汪人实体借贷了东乡语^①的第三人称领属后

^① 唐汪人和东乡人祖先的基因成分来源不同,形成方式不同,历史不同(请参见 Xu & Wen 2017),不能混为一谈。

缀 -ni, 同时又模式借贷了这一句法形式。

甘青汉语里一些第三人称的表达形式显然是从非汉语而来的, 这些借贷基本属于实体借贷。非汉语的一些表达形式也是互借的结果。甘青蒙古语族诸语专用的第三人称代词有两组。一组是 rgen/rgan, ergen, erken, gan, 这组词实体借贷了藏语的 rgan(师长、先生、老者), 做第三人称代词使用。一组是 ndzaŋ, ɒdzaŋ/adzaŋ, ədzaŋ, ndzen, dzaŋ, 这组词的来源是蒙古语自身的词——edʒen(主人), 但是模式却来自藏语。汉语方言特殊的第三人称代词也有两组, 均属于实体借贷。上述的 adzaŋ 组在汉语方言里形成了不同的变体如 i⁴² tɕiə²⁴³, vu⁴² tɕiə²⁴³, aijie, 嘎家, 阿吉 atɕi, 俺己 ǎ¹¹tɕi⁵⁵, tɕiə, 家。另一组在汉语方言里实体借贷了突厥语族 u/o、gu/go 系列。上述的 rgan 系列在当地汉语里未见。

“名词 + 第三人称 P3^① 领属后缀”的形式, 演变轨迹大致如下: 甘青蒙古语部分继承了通用蒙古语的句型“名词 + P1/P2/P3”, 东乡语保留了蒙古语的这个句型, 保安语和土族语简化了这个句型, 只有“名词 + P3”。唐汪话也只用简化形式“名词 + P3”。20世纪60年代的兰州话、现在的陕北清涧话和横山话的“名词 + P3”使用的形式, 只能用于亲属称谓。对于母语者始终是汉语的群体来说, 这一形式是简化形式, 对于几百年前少数非汉人群来说, 这一形式是其祖语的一种残存。由于这些早已汉化、和汉人融为一体的人已世代以汉语为母语, 所以这一用法是否还能存活下去是个疑问。兰州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例子, “他 + 名词”表示领属的用法似乎已经替代了“名词 + 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的用法。实体借贷和模式借贷在最初形成阶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今天世代以汉语为母语的陕北人来说, “名词 + 第三人称领属后缀”可以说是一种模式借贷, 即语音是汉语的, 但是句法形式来自非汉语。很显然, 陕北这一用法来源的时间深度、历史层次还有待于通过其他学科领域的材料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 保朝鲁 贾拉森 1990 《东部裕固语和蒙古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布 和 1986 《东乡语和蒙古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布 和 刘照雄 1982 《保安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曹志耘 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 商务印书馆。
 陈乃雄 1986 《保安语和蒙古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陈元龙(阿·伊布拉黑麦) 1985 《甘肃境内唐汪话记略》, 《民族语文》第6期。
 陈宗振 努尔别克 赵相如等 1990 《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 民族出版社。
 丁一欢 2015 《兰州方言语气词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① 以下用 P1、P2、P3 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领属后缀。

- 杜冰心 2012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河州话特殊语法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校勘 1980 《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耿世民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1999 《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 耿显宗等 2006 《安多藏语口语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
- 龚煌成 2004 《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 何天祥 1986 《兰州方言里第三人称代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兰州大学中文系 1996 《临夏方言》，兰州大学出版社。
- 兰州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小组 1963 《兰州方言》，《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
- 李树兰 仲 谦 1986 《锡伯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林莲云 1985 《撒拉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刘勋宁 2013 《陕北清涧话的第三身指代给我们的启示》，《中国语言学》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照雄 1981 《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吕叔湘 著 江蓝生 补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
- 雒 鹏 2006 《甘肃方言第三人称代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雒 鹏 主编 2021 《甘肃方言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梦玲 2019 《青海贵德刘电话记略》，《方言》第2期。
- 马 伟 1994 《循化汉语的“是”与撒拉[sa/se]语法功能比较》，《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史秀菊 2010 《山西晋语区与官话区人称代词之比较》，《晋中学院学报》第4期。
- 斯钦朝克图 待刊 《东部裕固语与察哈尔蒙古语比较》，徐丹、文少卿、王传超主编《语言、基因和考古——以甘青地区为中心的跨学科探索》，上海科技出版社。
- 唐正大 2005 《关中方言第三人称指称形式的类型学研究》，《方言》第2期。
- 汪化云 2013 《西北方言指代词兼第三身代词现象的再探讨》，《语言科学》第1期。
- 汪化云 2016 《汉语方言三身代词与指代词关系的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 1: 153-174。
- 王双成 2009 《西宁方言的差比句》，《中国语文》第3期。
- 邢向东 2001 《神木方言的代词》，《方言》第4期。
- 徐 丹 2014 《唐汪话研究》，民族出版社。
- 徐 丹 2018a 《甘青一带语言借贷的历史层次及模式》，《民族语文》第6期。
- 徐 丹 2018b 《中国境内的混合语及语言混合的机制》，《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 徐 丹 2021 《汉语“波罗盖(膝)”的来源——兼谈汉语与非汉语的深层接触》，《民族语文》第3期。
- 杨 欣 2021 《生成语理论框架下兰州方言中“XP的个YP”结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杨永龙 2014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多功能格标记“哈”》，《方言》第3期。
- 尹 龙 1985 《循化话中人称代词的变格范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 余 丽 2015 《兰银、西南、中原官话动兼方类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 张 强 2021 《临夏方言格标记“哈[xa⁴³]”探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张 巍 2013 《兰州方言代词》，《丝绸之路》第 22 期。
- 张维佳 张洪燕 2007 《远指代词“兀”与突厥语》，《民族语文》第 3 期。
-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周伟洲 2004 《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
- 周伟洲 2015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二辑。
- Bhat, D. N. S. 2013 Third person pronouns and demonstratives. In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43>, Accessed on 2022-12-24)
- Dpal Idan bkra shis 2016 Amdo Tibeta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normative oral Amdo. *Asian Highlands Perspectives* 43.
- Gardani, Francesco 2020 Borrowing matter and pattern in morphology: An overview. *Morphology* 30: 263–282.
- Georg, Stefan 2003 Mongghul.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285–30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anhunen, Juha 2003 Proto Mongolic.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1–2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anhunen, Juha, Marja Peltomaa, Erika Sandman and Xiawu Dongzhou 2008 *Wutun*. Muenchen: Lincom Europa.
- Kotwicz, Władysław 1936 Les pronoms dans les langues altaïques. *Mémoires de la Commission Orientalistes* 24.
- Matras, Yaron and Jeanette Sakel 2007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of pattern replication in language convergence. *Studies in Language* 31. 4: 829–865.
- Nugteren, Hans 2003 Shira Yughur.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265–28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bin, Françoise to appear *Parlons Amdo*. Paris: l'Harmattan.
- Sakel, Janette 2007 Types of loan: Matter and pattern. In Bossong Georg, Comrie Bernard and Matras Yaron (eds.) *Grammatical Borrowing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5–29.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Sakel, Janette and Yaron Matras 2008 Modelling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grammar. In Stolz *et al.* (eds.) *Aspects of Language Contact: New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Findings with Special Focus on Romancisation Processes*, 63–87.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Sandman, Erika 2016 *A Grammar of Wutu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Slater, Keith W. 2003 Mangghuer.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307–32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vantesson, Jan-Olof 2003 Khalkha.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154–17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akata, Tokio 1987 Note sur le dialecte chinois de la région du Hexi aux IXe-Xe siècl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3: 93–102.

- Tekin, Talat 1968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Tekin, Talat 1995 *L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Istanbul: Simurg.
- Thomason, Sarah Grey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Sarah Grey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inreich, Uriel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The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 Xu, Dan 2021 Intertwined model of syntactic borrowing in the Gansu-Qinghai linguistic area. *Himalayan Linguistics* 3: 146–168.
- Xu, Dan and Shaoqing Wen 2017 Formation of a “mixed language” in Northwest China: The case of Tangwang. In Dan Xu and Hui Li (eds.) *Languages and Gen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djacent Regions*, 87–105.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 Zhong, Yarjis Xueqing 2019 *Rescuing a Language from Extinction: Documentation and Practical Steps for the Revitalisation of (Western) Yugur*. Ph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Zhou, Chenlei 2022 *Zhoutun*. Oxon/New York: Routledge.
- Zhu, Yongzhong, Üjjiyediin Chuluu, Keith Slater and Kevin Stuart 1997 Gangou Chinese diale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strongly altaicized Chinese dialect and its Mongolic neighbor. *Anthropos* 4. 6: 433–450.

Third-person Pronoun and Possessive Suffix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XU D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phenomena: 1. The ongoing variation of the third-person pronouns used in the Han and non-Han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Gansu-Qinghai area; 2. The use of the pattern “Noun+third-person possessive suffix” in a few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Except for *ta*, the third-person pronouns used in the Gansu-Qinghai area have a rich inventory, some having come from non-Han languages that borrowed from each other, thus forming a unique Matter Borrowing network. The “possessive suffix” usage attested in some Northwestern regions has a deeper time, being a residue of the Tungusic, Mongolic, and Turkic languages which influenced the Chinese languages at different periods. Whereas the phenomenon as observed in Shaanbei is probably an instance of Pattern Borrowing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languag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Tangwang language suggests that Matter Borrowing and Pattern Borrowing should have worked hand in hand.

Keywords: third-person pronoun, Northwestern regions, matter borrowing, pattern borrowing

(徐丹 德国美因兹大学 / 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